

忆丁瑜先生兼谈《延年集》编纂

李 坚

丁瑜先生是善本组的老人。我 1996 年入馆分配到善本组时，丁瑜先生已退休多年，并未与之共事，只是经常听同事们谈到丁先生。当时的组长程有庆老师经常提起：丁先生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主要编纂者，等等。李际宁老师说起《碛砂藏》，也总要提起丁瑜先生。近些年先生还参加了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的前期选目，以及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会，《永乐大典》采访鉴定会等工作。所以，提起丁先生的大名，不禁有些肃然起敬。而印象最为深刻的，则是每年春节前全组和老同志一起聚餐欢聚的情形。

组里的老先生很多，冀淑英、丁瑜、王玉良、杨讷等先生，每年春节前，都会请回来全组一起聚餐，与大家欢聚。与杨讷、王玉良等其他几位健谈的先生不同，丁先生每次来了都不声不响，笑咪咪地微微鞠躬，不停冲大家点头，特别和蔼可亲。大家兴致勃勃地寒暄聊天，丁先生也多是在一旁安静地聆听，很少插话。最近十年来因年事过高，丁先生已经不能参加组里聚餐了，但我还能常常想起他每次来组里，推门进来满脸笑意微微鞠躬的样子。



图 1 2017 年春节慰问（左起：程有庆、丁瑜、陈红彦、李坚） 图 2 2018 年春节慰问（左起：黄霞、丁瑜、程有庆）

与丁先生的接触增多，是 2014 年我担任善本组组长之后。每年春节陪着古籍馆陈红彦副馆长和程有庆老师等去丁先生家慰问，先生每次看到我们都非常高兴，很愿意和我们聊天，只是自己说话不多，多是听着陈主任和程老师在说，时不时让我们吃水果。儿子儿媳照顾得周到，丁先生的气色非常好，很多年了，似

乎容貌没有什么变化。

2019年9月9日国图110周年馆庆前夕，以丁瑜先生为首的8位国图老专家给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很快收到总书记的回信。这是党和政府对文化工作的重视，是国图人的骄傲，丁瑜先生是善本组的前辈，当然更是善本组的骄傲。

2019年12月，丁先生的故交、著名版本学家沈津先生到北京来，专程带着复旦的学生去拜访丁先生。因沈先生这次拜访，我们才知道前不久先生曾因脑梗住院。得知此消息，大家都很牵挂，我因为工作较忙走不开，便请程有庆和李际宁两位老师代表善本组去看望先生，他们二位回来时非常高兴，说丁先生恢复得很好。

2020年春节前夕，陈红彦副馆长、程老师和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去丁先生家慰问，先生似乎与往年没有太大差别，只是稍微显得弱些。我们感慨于高龄的丁先生大病后恢复得如此之好，子女们照顾得真不错。临别时一起拍照留念，丁先生轻轻说了句：“给我洗几张。”之后，我特意到冲印店里将最近几年的照片都冲洗了一份，同时，又请组里的年轻同事蒋毅把典籍博物馆大厅里习总书记给国图老专家们回信的雕塑也拍了照片，一起给丁先生寄去。

6月16日，北京新发地疫情爆发之际，传来了丁先生仙逝的噩耗，我恍惚还有些不敢相信。虽然先生年事已高，但我总以为他老人家会一直这么慈眉善目地微笑着，不会离去。据说丁先生当天上午感觉有些不舒服，下午就走了。先生走得安详，没有病痛折磨，也是福气。

丁瑜先生是谦逊而和蔼可亲的好人，他的离世，令善本组的众多同事伤感不已。前几年刚刚退休的申军老师说：“我到善本组时丁老已退休多年了，因此我和他接触并不多，只是每年春节前和老同志聚会时才能见到他，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和气可亲的长者，一个没有学者架子的学者。记得他爱喝酒，我陪他喝酒，他点名喝小糊涂仙。遗憾的是我没有机会和他共事，接受他的教诲。如今丁先生已驾鹤西去，我将怀念他，好人会得好报，祝他在天国生活得幸福。”申老师的话，道出了每一位善本组人的心声。

丁瑜先生是著名的古籍版本鉴定专家，但我对于丁先生的学术成果，却了解

不多。有幸的是，2015至2016年，我参与了编纂丁先生的文集《延年集》的工作。作为文集编纂的主要联系人，我负责与张志清副馆长、古籍馆陈红彦副馆长、沈津先生、善本组参与此事的各位同仁、出版社等对接沟通，上传下达，对于文集编纂的全过程以及各方面的情况都有所了解。由于我们编纂文集的经验有限，加之时间紧张，很多问题考虑不周，书末没有附后记等说明编纂过程，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现借悼念丁瑜先生之机，简要叙述当年文集编纂的经过及其相关事宜，权当补充“后记”一篇，以飨读者。

2015年2月9日中午，张志清副馆长把我和副组长李文洁叫到他的办公室布置任务说，为庆祝2016年丁先生90寿辰，需尽快编纂出版丁瑜先生的文集，具体的文集编纂工作由善本组来承担。

早在2004至2011年，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联合编纂《芸香阁丛书》，收录顾廷龙、赵万里、潘天祯、冀淑英四位先生的文集，几位先生都是图书馆古籍版本目录学领域的宗师。图书馆古籍界除了这几位大师，还有一些学养深厚的专家，他们在本专业颇有建树，但淡泊名利，毕生坚守基础业务建设，将更多的精力投入集体工作和项目中，为图书馆的发展贡献良多。丁瑜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能为丁瑜先生编纂文集，并把此事当作新时代古籍保护计划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对这些一生默默奉献的专家的尊敬与重视。

张副馆长对文集编纂一事高度重视。2月9日刚给我们布置任务，2月15日就电话询问是否已经着手在做，是否已经与丁先生联系。紧接着与国图出版社沟通，确定由已故的贾贵荣主编（1961.12.14-2020.4.21）负责落实此书的出版。

张副馆长对文集编纂的每个环节都及时做了指示，对我们汇报和反映的问题，无论是OA邮件，还是微信信息，都及时回复、随时解决，使得整个工作在有序平稳地进行。文集的字体字号、版式、开本、封面、印装经过张副馆长拍板，均参照《赵万里文集》，并决定使用简体字；封面，出版社提供了两个设计稿供选择，由张副馆长选定了其中一款。

张副馆长还特别强调，文集编纂时要充分尊重丁先生的本人意愿，尤其是序

言请谁来写、文集的名称等，都一定要听从丁先生的想法。2015年7月23日，张副馆长在给我的一个回复邮件中，有这样几句：“很感谢善本组高效率完成了丁先生文集的整理工作”，“（关于文集的名称）……如不叫文集，可请丁先生自己定个名字。比如像李致忠先生过去出过《肩朴集》，类似这样的名字，我觉得也不错”，“二、序言由谁来写，我建议由丁先生来指定撰写人为佳。三、《延年诗草》，我觉得不错，建议附在后面出版。”最后强调“上述只是鄙意，还要以大家共同意愿为正，当然最重要的是丁瑜先生自己的意愿。”

张副馆长起初还计划文集出版以后，组织一个小型出版座谈会，由善本组牵头，以组内的老中青为主，包括退休的，叙叙旧。丁先生愿意请外馆的哪位先生，由老人家自己决定。但行事低调的丁先生坚决拒绝，这个计划便没有实施。

善本组承担了文集的全部编纂工作。接受任务之后，程有庆老师马上与丁先生联系，告知此事，并请丁先生做相关准备。丁先生非常高兴，积极配合，为我们提供线索。

我们尽快将丁先生的论著目录搜集了一下，组里的几位年轻人都参与了具体工作，蒋毅、刘悦、程天舒参与搜集、复制论文，在孔网上购买专著，去港台阅览室复印《联合早报》……，初期查找到16篇论文，1部专著，形成初步的目录。经过几次核查，又增加了一些。后期校对过程中，贾大伟还核查了缩微的《中国文物报》，确认论文《“一方古砚写传奇”补遗》纸质复印本的夹字内容。有些文章，因为发表的年代较早，已经不容易找，丁先生自己有保存的，也加入进来。根据编辑的建议，我们又请丁先生找出一些照片，程老师取回来扫描之后提供给出版社，用于书的前面彩页。

程有庆老师是文集编纂的主力，负责论文的分类、审稿校对中疑难问题的解决、书名确定等，并承担了与丁先生联系沟通的重任。程老师是当之无愧的与丁先生沟通的不二人选，丁先生与他共事多年，很熟悉，交流起来更容易；程老师敦厚随和，对老年人热心、耐心、细致体贴，深受各位老同志信赖；更不用说程老师具有丰富的古籍工作经验，在古籍著录和版本鉴定方面有不少独到见解，为保证文集编纂质量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与老人家沟通，仅靠电话，沟通效果往

往会大打折扣。程老师无数次前往丁先生家，向先生汇报搜集资料的进展，听取先生的意见，沟通某些问题的处理办法，而对于较难抉择的事情，往往会提出一些建议，供先生选择，这些都是文集得以顺利编纂的基础和保障。

文集中能包含丁先生的诗作《延年诗草》，也很不容易。在文集编纂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也许是受到领导和同仁们的热情感召，谨言慎行的丁先生拿出自己多年来的诗作集成，自名《延年诗草》。丁先生家老宅位于西城区延年胡同，自幼居住在那里的丁先生对延年胡同充满感情，将自己的居处命名为“延年居”，诗作命名为“延年诗草”。丁先生征求张副馆长和程老师的意见，这些诗作是否能收入文集中？张副馆长和程老师都认为诗作颇有文采，尤其是反映了丁先生所经历各个历史时期的一些人和事，具有史料价值，值得收录。于是文集中增加了一部分诗作。

文集名称的确定，也经过审慎的思考。起初，出版社耿素丽老师建议拟定类似“×××版本目录学论集”的名称，后来觉得还是起个有寓意的名字更为妥当。程老师琢磨了很久，没有找到特别恰当的，也曾请沈津先生费心考虑。后来，受丁先生自拟的诗作名称《延年诗草》启发，程老师建议命名为《延年集》，先生与延年胡同关系密切，“延年”二字寓意也好。这个提议得到丁先生本人的认可，沈津先生也表示肯定，张副馆长很支持。文集的名称就这么确定了。

文集的分类排序，是由程老师完成的。全书约 26 万字，分三大部分，先后顺序为：一论文 34 篇、二专著 1 部（《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三诗稿 71 首（按：最初排序为一论文、二诗稿、三专著）。论文按类排序，但不明确类别名称，因有些论文不易归类，仅作模糊处理；诗稿则根据写作时间排序（按：初选 77 首，经丁先生与程老师再次斟酌之后，又删除了几首不宜对外公开的，最终选定 71 首）。

全书的序言有两篇，一篇是韩永进馆长撰，一篇为沈津先生撰。组里的文学博士程天舒为韩馆长作序提供了一些资料；沈先生与丁先生几十年的交往，序言饱含深情，娓娓道来，很打动人。沈先生写稿格外认真，发来初稿之后又两易其稿，不断有修改。

沈津先生对文集的编纂贡献颇多。沈先生与丁先生在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共事多年，情谊深厚。他对编纂丁先生文集非常热心，除序言外，还提供了一些与丁先生的往来书信，积极为文集的编纂出谋划策。不少问题我们都是与沈先生商量决定的。

2015年12月底，文集的初期工作完成，2016年初将稿交国图出版社。最初由耿素丽老师负责，后因耿素丽老师岗位变动，2月底交由王雷老师负责。王雷老师非常努力，想尽一切办法赶时间，以期尽快出版。3月7日王雷老师将初稿校样排出来，我们便开始校对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校对任务交给了组里退休同事唱春莲老师，唱老师从事古籍工作多年，认真细致，校对又快又好。得知是为丁先生出版文集，毅然勇挑重担，没日没夜地加班校对，以保证如期出版。3月15日完成一校，交还出版社；3月29日二校稿样出来，唱老师开始二校；4月11日完成二校返还出版社。4月26日出版社出第三次清样，再返还唱老师；4月29日，唱老师完成三校。

三校完成后，由程有庆老师做终校，并同时送给丁瑜先生一份，丁先生本人也开始校核。程老师和丁先生同时看样稿，丁先生翻阅资料，认真审阅，校改了不少，认为有些地方一定要改。尊重作者本人的意见，程老师把丁先生的意见及时吸收进去。

丁瑜先生的生日是5月7日，张副馆长本来希望在此之前出版。当得知丁先生和程老师同时审校的时候，他非常理解，赞成吸收先生本人的意见，认真校对，保证质量，便允许出版时间稍微推迟一些。

在几次校对过程中，解决了不少问题，比如排印稿中有很多异体字，繁体字，一并改为简体字；有些漏印的内容也加上；用阿拉伯数字还是汉字数字，最后都根据古籍著录的规范改过来。

国图出版社在此书出版中也做出了很大努力。贾贵荣总编亲自督促进度。耿素丽老师在前期提了不少有益的建议。责编王雷老师积极配合支持，千方百计保证出版时间，严格三审三校，有疑问及时与我联系沟通；并尽量为我们的校对提供便利条件，对我们的修改要求也最大限度地满足。

5月6日，校好的稿件送还出版社；16日出版社做好最后一稿，返回以后由程老师审最后一遍，5月19日审完后交还出版社，正式下印厂。7月5日，得知丁先生因病住院刚出院，张副馆长催促出版社尽快出书，得到反馈说已经印好了，正在装订。7月13日，我们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运回100册，当天程老师就先取了5册送到丁先生家里。拿到样书，丁先生非常高兴，非常满意。

7月25日，程老师和我一起又去丁先生家，再送去部分样书，并带着《延年集》的出版合同请丁先生签字。古籍馆陈红彦副馆长让我们带了两册书过去请丁先生签名，交由名家手稿库签名本中保存。《延年集》的编辑出版工作顺利完



图3 丁瑜先生为国图名家手稿文库题写《延年集》签名本



图4 程有庆、李坚与丁瑜先生合影

编纂《延年集》，是善本组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善本组老中青同仁的一次团队作战。通过这次编纂工作，我感觉与丁先生等老一辈图书馆员的距离拉近了，同时，也感受到了国图古籍事业先后传承的脉动。